

金春明 自选文集

JINCHUNMING ZIXUAN WENJI

金春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春明自选文集

JINCHUNMING ZIXUAN WENJI

金春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春明自选文集/金春明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6

ISBN 7-220-06001-7

I.金... II.金... III.①金春明-文集②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D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045 号

JINCHUNMING ZIXUAN WENJI

金春明自选文集

金春明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汪 漪
邱云松
杨 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电话:86661236 86666018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028-83139196)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850mm×1168mm 1/32

23.75

4

596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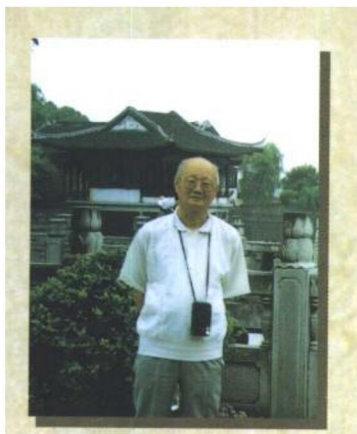
2002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220-06001-7/D·786

40.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金春明，1932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1950~1952年秋，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高级部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中共党史教员。1955~1957年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训部中共党史专业进修。1961年4月调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1986年任教授、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国务院对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党史党建组的成员。

主要研究成果有《“文化大革命”史稿》、《“文化大革命”论析》、《“文化大革命”简史》（与席宣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建国后三十三年》、《不平凡的七十年》（与黄少群合著）、《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主编）、《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四人帮沉浮记》、《新中国编年史》（撰写其中“文革”十年）等20余本专著。其中《“文化大革命”简史》，已译成日文和韩文，分别在东京和汉城出版。《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被评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研一等奖。近20多年来发表各种论文和文章约200篇，其中多篇获得各种奖励。

自序

得悉四川人民出版社愿意为我出一本个人的文集，心里真的是十分高兴。年近古稀的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激动，但多年的夙愿有可能变为现实的时候，喜悦的心情还是难以用笔墨完全形容的。

我是属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专门培养的第一批理论教育工作者。看到同辈的一些人纷纷出版个人的文集，十分羡慕。同时也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应该有一本自己的文集。而且这种念头愈来愈强烈。客观地衡量一下，这些年来个人写的、合写的、主编的以及参与写作的已经出版的各种书籍，大概二十几本；个人写的大小文章，已经发表的有二百多篇。其中有些篇是属于应时之作或奉命之作，时过境迁，今日再看已无多大意思。但确有些文章是花了一番心血，苦心探求之作。有的在当时还属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努力创新之作，今日读起来可能还有一点参考价值。这些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自己搜集都颇为困难，别人更可想而知。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经过筛选编成一本文集贡献给社会，似并非浪费。而对于自己来说，编一本个人文集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半个世纪自己所从事的理论教育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检查、回顾、反省和总结。

1948年，我正在东北解放区的东北大学学习。听说为迎接建国而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党的高级干部和宣传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马列学院的名称，由刘少奇同志兼任院长。马列学院1948年11月在河北省平山县开学。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有成为马列学院学员的奢望。1950年初，听说中共中央决定在沈阳成立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并已任命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为分院院长，正在各地挑选学员。正在东北大学政治学院担任教育干事的我，作为新党员有幸成为被挑选的对象，于1950年“五一”前被集中到沈阳，住在太原街的东北旅社。但等了很久才打听到一个消息，马列学院东北分院不再成立，原因不详。已被集中到沈阳的一百多名候选学员中，一部分被分配工作，而我和一些同志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高级部学习。1950年9月1日开学。所谓高级部，就是理论部，学习时间二年。除学习时间比轮训部长之外，学员水平和政治待遇等方面都比轮训部差，实在没有什么高级的地方。不过这两年对我的一生却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毛主席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还没有出版^①，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数量有限，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这当然是我们学习的主要教材。学习的其他原著是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中文版《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还有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讲课的教员除班主任苗宝泰（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还给毛主席当过短时间的秘书）、教育长叶方外，主要是当时东北局宣传部的一些负责人，如刘芝明、陈放、富振声、刘继良等。后来又增加从马列学院毕业后到东北局党校任教的杨瑾、李英华、王伦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是1951年10月出版发行，第2卷是1952年4月出版发行。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讲政治经济学的林里夫。他每次上课总是搬着厚厚的一大摞书放在讲台上，并在课堂上拿着一本德文版的《资本论》边翻译边讲授。这位教授很少看见他的笑脸，总是板着严肃的面孔，满口名词术语和西式倒装句式的长句子。一个概念又一个概念地套在一起，逻辑性很强，但很难懂。虽然听他的课很费劲，但却引发我对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用很大的毅力通读了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到20岁，实际经验很少，理论水平也低，理解程度自然有限。但真正集中精力认真苦读马列原著还得算那两年。应该说是打下了比较牢实的理论基础。记得当年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套用革命导师列宁的一句话：“马列主义是一个整块的钢铁”，内容写的什么已不记得。大概是生平写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2年7月从东北局党校高级部毕业。刚满20岁的我和十几位同学一起留校，组建教研室。我在东北大学是选读的政治经济系，在东大政经系的一年多，实际上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记得当时开了一门新课，世界经济地理。教员是一位从解放前的大学转过来的。这位老师大概是一位不愿惹是生非的教书匠。他先从地中海沿岸讲起。一个学期只给我们讲了两个小国：马尔他和塞浦路斯。对他讲课的声貌还依稀有点印象，可是真对不起，连这位老师姓什么都忘记了。到东北局党校后，仍喜欢政治经济学，通读《资本论》第一卷，就是一例。可是，喜欢政治经济学的我却被分配到中共党史教研室。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一切听从党安排”。我一句价钱也没有讲，就去向党史教研室主任李英华报到了。并且一次分配定终身，就这样搞了一辈子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中间当然也不是没有改行的机会。1952年，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节约检查委员会搞“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时，就有人建议我留在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我

感到自己不是作党务工作的材料，婉言谢绝了。1955年，我考入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师资训练部中共党史专业，学习两年多。毕业时部领导找我谈话，要我留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但那时认为中央党校门槛太高。自己年纪轻，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没有同意。中央党校毕业后回到沈阳。但东北局党校（当时已改名第一中级党校）同全国党校一样，在反右派运动后停止招生了。于是，我被借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从事实际之作。说是实际工作，主要是下乡下厂调研，搞运动，接触社会自然比在党校院里要多，内容更丰富、更生动、更具体。但是也少不了文字工作。替省委起草报告、文件，编写会议简报、写调研报告等等，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是一个锻炼。本来有可能在中共辽宁省委一直工作下去，三年多的实践已经比较习惯了。不过我又于1961年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这回是死命令。中共中央书记处下令指名抽调各省市共40多名理论干部，于“五一”前到中宣部干部处报到，家属随同进京。这样的命令是不能不服从的，于是全家进京。到中宣部报到后被分配中央党校。这一下子就在中央党校呆了四十年。

既然是搞理论教育工作，就离不开讲和写。就需要经常思考和研究一点问题。我这个人又属于那种常爱研究一点问题，又爱发表一点看法的人，于是写点东西投给报刊也就很自然了。50年代后期，我就在《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还有《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过七八篇短文。有几篇是歌颂“大跃进”的。那时是热情很高，头脑发热，真诚地赞颂和盼望共产主义早日在中国实现。大概也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吧！不过在省委调研室工作，接触实际的机会很多，总是会看到不少问题，头脑也逐渐冷静许多。1959年夏，我写了一篇《谈留有余地》的千字文，发表在《辽宁日报》上。也算是有感而发吧。虽然毛泽东讲过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什么

是留有余地，解释和阐发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在当时那种十分浓厚的“大跃进”气氛中，写这样的文章还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大概对当时的问题，很多干部是有同感的。这篇小文章发表不久，就有一个单位派人到辽宁省委调研室找到我，请我去作一次关于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问题的报告。当时已是7月，庐山会议已经召开，我已听到一些消息，于是婉言谢绝了邀请。批判彭德怀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后，十分后怕，如果我当时应邀作了那场报告，很可能成为省委机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从此之后，我就停止给报刊写文章。除了到中央党校后，奉教研室主任李践为之命，给天津《历史教学》杂志写过一篇：《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的党史文章以外，再没有发表过任何个人的文章。^①这一停就是二十年。

理论工作者个人的命运和经历，同整个党和国家的命运和经历是分不开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党校于1977年复校。在新任副校长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央党校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特别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和全国的政治大气候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作为理论工作者的我注入了新的生命，开始了新的历程。

朋友们常给我提一个问题：三中全会后党史研究的天地十分广阔。你原来又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继续研究不是很好嘛！为什么放下抗战不搞，要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史？其实这也不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开始是奉命研究，到进入角色，研究出兴趣之后，就欲罢不能了，于是就一直坚持下去了。这样，“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就成为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的主要研究课

^① 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之类东西，六七十年代不能不写，但同学术研究文章不同，那已是另外一类性质的东西。

题，后来并成为我指导博士研究生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奉谁之命呢？直接给我和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同志们下达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任务的，是当时的副校长胡耀邦。他在1977年秋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要党史教研室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党的十一大提出的“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继承了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经过十次路线斗争。其中，第九次是反对刘少奇的斗争，第十次是反对林彪的斗争。华国锋又增加了一次，即第十一次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就是以此为合法依据，全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史。胡耀邦强调重点要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求我们把史实梳理清楚，弄清“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并总结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他特别强调，不要泡在文件堆里，就文件解释文件，以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以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标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会后，党史教研室反复研究，抽调力量组成一个“三次路线斗争”研究组，我被任命为组长。这个组研究的实践过程是曲折的；成员变化颇多，多时超过十人，少时只有四个人，我作为组长却一直坚持下来。这期间，冯文彬、吴江、缪楚璜等校室领导同志都给这个小组以指导和帮助。这个组的研究成果曾在校内发给学员讨论，产生相当影响。关于这一段的经历知之者不多。1998年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2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把这一段史实公诸于世。虽然“三次路线斗争”研究组早已不存在了，但这一段的研究却为我至今从事的“文革”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史是极其特殊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中是一个特殊时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

中也是一个特殊时期。一个执政党的最高领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巨大权力作支柱，来摧毁自己和战友们以巨大代价千辛万苦缔造的党政机构，企图用“天下大乱”为手段来达到他理想中的“天下大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大概也是没有前例的。这段历史中，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多，研究的难度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崎岖的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敢希冀过的。但是“崎岖小路的攀登”本身却吸引了我。在艰难的探索和攀登中，我逐渐对“文革”史的研究产生了浓重的兴趣。特别是80年代初，我们不但在中央党校内部讲授“文化大革命”史，而且应邀到很多部门和地区去讲课。当时组里的几位同志：于南、谭宗级、许迈扬和我，几乎四处奔走，应接不暇。广大干部和群众渴望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深情和目光，要求对那些错综复杂的事件有一个是非判断和明确说法的极其强烈的愿望，使我深为感动，增加了沉重的责任感。直接听课的人是有限的，而报刊有更广阔的接触面。于是，在繁重的讲课任务之外，我开始挤时间为报刊写文章。

那时我已经年过半百，可是精力好像从来没有那么旺盛过。白天讲课、开会，晚上突击写文章，夜里二三点上床是经常的事。勤奋出硕果，每年都有一二十篇文章发表，最多的一年竟发表30多篇。总计80年代发表的各种大小文章在150篇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这既是主观努力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客观需要。特别是1984~1985年的全党整风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因此，稿约不断，催稿的电话几乎无日无之，成为文章旺产的一个动力。

这个时期几乎忙到空不下来认真看材料、思考问题。自然也

就很难产生比较系统的有份量的专著了。这期间集结成册的，只有在讲稿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小册子，1985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本“文革”史研究的论文集：《“文化大革命”论析》，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这也可以看做是“文革”史研究专著的话，在全国算是最早的两本。另外，由我主持全组集体写作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也在1985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印数达55万册。这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写成的急就篇。对全党80年代中期的整党学习，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总之，80年代中期是我这一辈子写作一个旺产期。

不过，靠强烈的政治热情而保持的旺盛精力是不可能持久的。年龄是不饶人的，我终于病倒了。记得是1985初夏，在完成校内讲课任务后，我应邀去山西省讲课。第一站是中共长治市委党校。当时长治市委党校负责教学的郭副校长是由中央党校调去的。他亲自到京邀请，盛情难却，我就答应了。当时长治市还不通火车，我是乘去太原市的火车在榆次市下车转路的。下火车后，看见接我的不仅有长治市委党校的同志，还有晋中地委党校的同志。当时我答应了晋中党校同志的邀请，回程到他们那里讲课。到长治市，讲课之余还参观了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旧址。长治的课还没有讲完，中共运城地委党校的曹校长乘吉普车亲自来到了长治。又是盛情难却，长治讲完课马上奔运城。当时的公路状况较差，路上运煤的大卡车和拖拉机很多，道路拥挤，又碰上一一起塞车事故，吉普车在太行山的山路奔行一天，也没能赶到运城。到夏县时天已经黑了，只好到县委招待所住下。听到为修三门峡水库而搬迁的长乐宫就在这里，根据我的要求，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我们就去长乐宫看壁画。刚参观一会，陪同的人告诉我，夏县的县委书记来了。这位书记见面没讲什么客套话，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下午要在他们这里讲一场，而且通知已经发下了。这

就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余地，只好遵命。本来打算经过汽车的长途奔波之后，到运城能休息一天，这样只好放弃了。在运城的三天讲课尚未结束，邻省陕西省渭中地委党校的教务处长，乘一辆吉普车赶到，请我去他们那里讲课，而且答应陪我游华山。我这个人对于名山大川很有兴趣，对华山在看过电影《智取华山》后可以说是心仪已久，在讲课之余去爬爬华山自然是一件乐事。可是当时的身体状况却令我担忧。不仅讲半天课下来感到十分劳累，而且胸闷，睡不好觉，这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同运城党校曹校长商量怎么办？他认为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问题不可马虎，还是以回京检查为宜。我接受了曹校长的关心和劝告，在运城讲完课后，就直回北京，并请他代我对晋中党校、渭中党校和后来邀请的山西省委党校一并表示歉意。

结束这次半个多月的山西之行，正好赶上中央党校的干部体检。我的胸透被发现有问题。接着是几个医院的一系列检查，包括CT，最后被诊断为肺癌。是良性瘤还是癌瘤，虽然一时难以确定，但必须住院做手术，已成为医生一致的意见。这样，1985年8月初，我在北京友谊医院动了开胸手术，被切掉了一叶肺和一根肋骨。幸好活检证实，肿瘤是良性的。记得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时，一位“缺肋少肺”的人被大家称为“三等残废”，没想到一贯自视健康的我，自己也步入了这一行列。幸亏得到夫人李振霞和当时在这个医院作外科大夫的女儿金萤的全力照护，术后恢复良好，然后就出院回家疗养了。这次是强迫休息，一休就是一年。这一年除了脑子里还偶尔想一点问题外，基本上没有发表什么东西。算是旺产期后的冬眠期吧。

人身体器官的能量据说都是有贮备的，以便缺损时代偿。肺的功能可能确实如此。人的肺有5叶，我被切除了最大的左下叶。开始时说话声音小，没力气，上楼梯就气喘，连家里的三层楼也要别人扶着，走一步停一停，十来分钟才进家门，但逐渐就

日益好转。一年后，走路、说话均无大碍了。恢复讲课、作报告，大约是在三年之后。对于年过半百的人，能够恢复到这样程度，也是可以令人满意了。

进入 90 年代，全国的大气候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大众关心的热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不仅不再是热点，还有点被有意地淡化。而我在生病之后，从党史教研部转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工作。不再或很少有讲课任务，故而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翻阅资料，思考问题，对某些专题进行较系统地研究。我的研究和写作重点，也相应地从写文章转向了写专著。这十年主持完成了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八五课题，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和《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重点课题，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写了两本关于“文革”史的专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文化大革命”简史》（与席宣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与夫人李振霞合写了两本关于外国的书：《英伦之旅》（中共党校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中国教授眼中的美国》（团结出版社 1998 年 1 月出版）。还有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一本是由香港开明书店 1992 年出版的，另一本是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其他还有《不平凡的七十年》（与黄少群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与朱地合著，重庆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廖盖隆、庄浦明主编，我写其中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我还主编了一套共 9 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小丛书，我写了其中的《“四人帮”浮沉记》，均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 1998 年出版。近几年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材《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的编写工作。这些研究和写作在时间上有长有短，也有互相交叉，平均起来每年有一本，也算是另一个旺产期吧。

这十年中文章是写得不多的，年均只有5篇左右。内容也不像80年代，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选题的面分散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党史研究和其他一些问题，还包括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和给别人的著作或文集写的序。不过，我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并没有中断，而是在继续思考和探索。自己感到并没有在两本“文革”史专著发表后停步不前。如：《绝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两个文革”说与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都是继续探索的成果。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我也届古稀之年。虽然随着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医疗改善，生活提高，人均寿命已经延长，七八十岁已不稀罕。但人体衰老的自然规律总是不可违抗的。尊重自然规律，逐渐放慢工作节奏，已是势之必然，也是子女们经常提出的心愿和要求，我也是愿意过一个愉快而安逸的晚年的。但是心里总有一点放不下的东西，就是当前国内“文革”史研究状况之不能令人满意。我虽然也明白，这是大气候造成的，个人力量有限，难以影响大局。但总是有一种没有完成胡耀邦同志委托的负疚之感。所以，很想在有生之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从事“文革”史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贡献一点微薄之力。但到底能做多少，尚是未知之数，只能是“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上边概述了自己一生的写作历程，也可以为读者阅读这本文集时，提供一点背景参考资料。

下边谈一下编辑这本文集时自己的几点考虑：

(1) 这本集子名为自选集。把自己写过的全部文章都搜罗进来，对自己没有这个需要，对社会也是一种浪费。50年代的几篇小杂文，对于自己是一种开始写作的珍贵纪念，但其内容对今日已如隔世，不宜再选。1963年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因受时代局限，在史实的选择和阐述上有较大片面性。故均不再列入挑选

范围。所以，我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个人所写的文章中挑选了一部分，大约占全部文章的近半数。所有已出版的个人专著或小册子，一律不再选入。有的文章虽然在当时产生相当影响，如：《刘少奇同志没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一文发表于《工人日报》1980年3月7日。因为是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文章，而且刊登在第一版上，而引起轰动。听说有人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追查批判。但这篇文章的论述和资料，今天看已属于常识范围，而且没有达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水平，故没有选入。有的单篇文章后来已成为个人专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避免重复就不再选入了。

(2) 已选入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理解和阐述。共有16篇；

第二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的。主要是建国以后半个世纪历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的心得和体会。共14篇；

第三部分是有关“文化大革命”史的总体研究和若干专题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文章在论证和举例方面有重复。但考虑是对不同问题和不同角度的论证，仍保留。共25篇。

第四部分是其他各种类型的文章。包括几篇理论专题的探讨，有感而发的小杂文和应邀给几本不同性质的专著所写的序，共21篇。总计76篇。

(3) 为尊重历史，所有收入文集的文章除印刷错误必须纠正外，全部文字一律保持发表当时的原貌。有些当时的认识和分析后来有变化，或现在看来当时的某个论断有错误和不妥之处，也一律不加改动。如有特殊必要，则加注释作些说明。

当时论文中引用的马列原著，大多是老版本的。新老版本的译文是有差别的。这样就出现了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引用的是马列著作的新版本，而前些年的文章又是老版本的不一致现象。怎

么办？反复考虑，为尊重历史保持原貌，这些引文和出处还是一律不加改动为宜。

(4) 为便于读者翻阅，按文章的内容而不是发表时间的先后，重新作了分类和编排。但在每篇文章的标题下均作了一个简单的题解，注明发表的时间和刊物名称，以及作者感到必须加以说明的话。

俗话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确实是他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体现。希望能通过这本文集使更多的人了解我；更希望通过这本文集与更多的同行有更深入的学术交流。

最后，要特别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汪漪同志，他也正是我1995年出版的个人专著《“文化大革命”史稿》的责任编辑。此次再一次同他合作，心情十分愉快，也增强了信心。

金 春 明

2002年6月6日